

21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

2008年

主编 / 韩忠良

本卷主编 / 祝 勇

21SHIJI
ZHONGGUO
WENXUE
DAXI
2008NIAN
SHANWEN

散文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WENYICHUBANSHE

21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

2008年

主编 / 韩忠良

本卷主编 / 祝 勇

散文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WENYICHUBANSHE

祝 勇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8 年散文 / 祝勇主编.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9.2

(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 韩忠良主编)

ISBN 978-7-5313-3457-6

I. 2… II. 祝…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5478 号

2008 年散文

责任编辑 李殿华 施凌飞

责任校对 金丹艳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355 千字

印 张 13.125

插 页 2

印 数 1—6 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457-6

定价:25.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88517857

序：坚韧中前行

祝 勇

在 2008 年中国散文中，至少有两篇是至为深痛的，并因这份深痛而在越来越多不疼不痒假装深沉的文章中显得格外夺目。凑巧的是，这两篇文章分别来自我所敬重的两位学者型散文家——敬文东和蒋蓝。这是两个注定与平庸和流行无关的人，正因如此，我们有理由对他们的作品寄予厚望。2008 年，我分别在《十月》和《书屋》上读到了这两篇文章，并相信 2008 年中国散文会因它们的存在而显得殷实——2008 年，中国散文一如既往地经受着各式各样的攻击和谩骂。原因之一正是因为某些批评家对散文的真实存在丧失了辨别能力，而他们的攻击也因其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而日益与文本脱离，沦为自说自话的词语游戏；原因之二，则是由于各路选家，正把层出不穷的年度散文选本变成一部部名人录，我们可以看到各路名人纷纷精彩亮相，论资排辈，握手言欢，堪称和谐社会的动人写照，唯独找不到的，是对艺术的起码诚实。

敬文东和蒋蓝谈论的是两个互不关联的历史人物，一文一武，一个是孔子，一个是石达开，但重要的，不是他们谈论什么（无论谈论对象是何许人也，最终都是在谈论自己），而是谈论的

深度与角度。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身体这一角度。尽管这两篇散文在题材与风格上大相径庭，但角度实验却令它们同样地耐人寻味。身体，在历史中无论如何是一项特殊的，同时，也是最隐秘的存在。它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社会，属于历史；不仅属于空间，也属于时间。我在《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一书中表达过这样的看法：“所有的历史都是在行动中产生的。思想史只有借助身体的援助才能获得实现，所有重大或者不重大的事件，都是在身体出场的前提下发生的。身体是作为历史的‘主体’存在的。离开身体的参与，任何历史都将被悬置。需要强调的是，所谓身体，是自然与文化的混合体，换句话说，身体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文化的产物，是物质，也是精神。”“作为历史的载体，身体内部包含着充足的信息，等待我们辨认、破译和解读。身体是历史的导体，我们可以向它问询关于历史的消息。如果说我们曾经信赖典籍，那么我们更应该信赖身体，因为蕴涵在身体中的历史，远比掩藏在典籍中的历史更加丰富、生动和亲切。在身体的介入下，历史不再显得空洞和虚无，而是变得富有温度和可以触摸。”^①

于是，一把雪亮的刀片，不合时宜地伸进一片风花雪月、歌舞升平。外表儒雅的蒋蓝终于亮出他手里的利刃，解剖中国超级专制主义的精神根源——那个黑暗语境中的血性法则：以血偿血，以肉偿肉。值得一提的是，石达开在用坚强的身体抵挡着凌迟者的刀锋的同时，对专制主义的血性法则并无任何非议，在他看来，凌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像真理一样确定不疑，如果接受这份极刑的不是自己，那也必定是他的对手，二者必居其一，在两把交锋的利器之间，必有一个身体作为献祭，像祭奠一场庄严的游戏。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英雄殉难的价值，因为他的血，

^①《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第29、31页，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实际上是为专制政权的暴力机器提供了最为合适的润滑剂，使它的运转更加有效和疯狂。中国的超级专制主义，需要英雄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饲养，唯有如此，才能日益壮大。英雄们成就了自己的英名，同时也成就了杀戮者的事业，英雄的挺身而出，使刽子手永远不会失业，立于不败之地的，不是英雄，而恰是他们的敌人。但英雄们别无选择。或许，这才是英雄的真正悲剧。

在当今各种附庸风雅的历史散文中，蒋蓝以他一贯的锐利与尖刻，抓住历史的破绽死缠烂打，加之他手术刀一般精准的语言技术，使他的散文常给人一种痛快淋漓之感。《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为我们呈现了这样的文字，其深刻，在当今中国散文中，算是久违了吧：

而对于视身体痛苦为生存常态的民族来说，西人所谓“灵魂的苦痛”在中国是不具备普世意义的。它过于高蹈和遥远，仿佛异类。对大众而言，流汗吃饭、流血赚钱本就天经地义；敢于寸刀割人，必然就有付出加倍代价的决心。所谓“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价值算式，一直就是历代革命者的身体筹码。因为除此之外，革命者实在拿不出什么可以换算的东西了。但西方人不同，他们可以开列出人身自由、爱情、子女、名声、前途等等筹码。国人灵魂的痛苦，基本上已经被身体之痛偷梁换柱，而且把身体之痛视为了一种合理的承受。那么，当权力的绞肉机已经逐渐钝化于这样的麻木群体时，如何让制度的刀片得到及时的更新换代，反倒是让操作者产生“灵魂的痛苦”了。

与石达开相映成趣的，是一颗更加不可救药的悲剧灵魂。他的悲剧，被历代文人当做一出正剧甚至喜剧来解读。或许，这正道出了悲剧的实质——最极致的悲剧，最终都将与喜剧混为一谈，正如我们无法分清堂吉珂德的故事是悲剧还是喜剧一样。作为一个悲剧（或曰喜剧）人物，孔子的一生都被一种深刻的悖论

所笼罩。这是一个在礼崩乐坏的年代痴迷于旧日时光的复古主义者所必然遭遇的悖论。他试图恢复中华民族的光辉美德，但他内心的火光越是明亮，黑暗就越是强大。黑暗企图吞噬每一缕生命的火光，光亮也是在与黑暗的对峙中显示自身的价值。他是一个与石达开有着相似命运的英雄。这是中国人在两千年的时间里祭奠和敬仰这位文化英雄的原因，尽管他在自己的时代看上去仿佛一名小丑。与所有关于孔子的作品不同，《绝望的回忆者》深刻地揭示了孔子的精神处境：“作为一个时间英雄，光阴的造反派，一个回忆者，孔子就像他宣称‘吾道一以贯之’那样，可以宣称‘吾“调”一以贯之’：这是一种在方向上具有向后性的语调，是一种十分费力的语调，因为它始终在不惜体力、不惜成本地和天下所有耳朵作战，却不清楚几乎所有耳朵都在忙于进化，都在听取时间的召唤向前奔突。但无所不知的笃定特性始终是孔子的语调的基本底色，包括孤独的语调甚至无言的恸哭在内的一切语势，都由无所不知的语调所派生，只因为整个东周唯有孔子听见了来自周公的召唤，整个东周只剩下孔子一个招魂术士。这是一种向种子的方向挺进、向时间的源头（其实是周礼的源头）行进的语调：它竟敢公然蔑视进化的方向，竟敢公然同时间展开拔河比赛。它的失败，它最后拼死一跃般的自我燃烧（即恸哭），给它自身披上了一件悲剧性的沉重黑纱。”

2008年，一些注定被历史铭记的大事在中国发生。与其相比，我们的文字显得那么微弱，在巨大的灾难与困厄面前，它们的功用比不上一个面包、一片止痛药。但它们存在着，并且在穿越了几千年的刀山火海之后依然健在，这证明了它们的价值——不同于面包，或者止痛药的价值。石达开的英勇无法真正结束那场凌迟，肉体永远不是绞肉机的对手，但文字是，只有文字，能够真正终结绞肉机的作业程序，使它变成历史文物。孔子早在两千年前就看到这一点，他看到了肉体的局限与文字力量的无限。通过对身体秘密的解读，蒋蓝也看到了这一点，无数的写作者都

看到了这一点。正因如此，在大多数人对这份价值产生怀疑的时候，仍有一些人坚守着它们，用手掌拢住奄奄一息的火苗，让它照亮生命的路途。张锐锋在《随记册》中说：“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类向善的表达。因而在一个善不能完全实现的社会里，文学总是充满痛苦。它的表达实际上更接近于倾诉。它在表达的过程中，不断感受着人们的苦难、不幸和迷惘，也梳理和编织着人们内心深处潜藏着的精神矛盾。”收入本书的作品表明了这一点。对于散文写作者而言，遭受诽谤与暗算越多，来自它内部的力量越是强韧。在大事之外，那些忠诚于文字的人们，彼此之间心领神会，传递着文学的消息，“通往未来的漆黑道路上，同路人彼此呼应，向散文的未来报讯”。坚持，构成了他们的常态。忍耐是必经之途，从孔子、石达开这样的英雄，地震废墟下的生存者，到每一个在暗夜里展开纸页的写作者。这使我们在2008年里目睹了诸如王充闾《断念》、耿占春《被抽空的时间与空间》、张承志《三笠公园》、马小淘《衣说》、李修文《荆州：劫难与花朵》、燕治国《走西口》、叶匡政《土改学：诉苦》、冯秋子《为父亲祈祷》、周晓枫《聋天使》、塞壬《在镇里飞》这样卓越的文字。中国的散文精神，正是蕴涵在这样的坚持，这样的文字中。2008年的中国散文照例没有奇迹——水从不把鱼当做奇迹，天也从不把鸟当做奇迹，即使英雄，在他的时代里也不被认作奇迹。但就在这种看似枯涩无味的坚持中，写作者们以各自的敏锐与深刻，精妙地表达了对于生命和历史的看法，表达了他们在冗长的岁月里的某些与众不同的发现，或温暖人心，或刀刀见血。他们无法与孔子或者石达开这样的英雄相比，但他们做了他们应该做的，有人会嘲笑他们，但感谢他们的人，注定会随之而来。

2009年2月23日于藏区康定

目 录

228 / 云南驿：英雄的栖居之地	胡廷武
237 / 开始之地	
——玉溪记	于 坚
252 / 走西口	燕治国

大 黑 天

265 / 大黑天	李 零
273 / 土改学：诉苦	叶匡政
278 / 为父亲祈祷	冯秋子
291 / 三宅记	彭 程
306 / 碎银	何向阳
326 / 聋天使	周晓枫
355 / 对三桩抢劫案的归纳	格 致
366 / 隔夜的鱼	陈蔚文
375 / 周家村笔记	江 子
384 / 在镇里飞	塞 壬
394 / 月圆之夜及其他	张悦然

绝望的回忆者

敬文东

回忆者的诞生

很久很久以前，在今天被指称为中国的这块土地上（尤其是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原一带），即使是每一个庶民、黔首或小人，都能依靠某种特定的、神秘的法术上达天庭，听取上天的旨意，进而安排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命运。聪明的圣人颀顼很快就意识到这种自我管理带来的严重危害性，于是命令羲和（即重黎）独掌“天地四时之官”，砍去了普通人与上天自由交流的路径，堵塞了庶民黔首曾经听力极好的耳朵，只留下一个狭窄、短促、呈爆破态势的孔道，用以接收圣人的教导——这个小小的孔道从此成为圣训恣意横行的专有通道；处于孔道尽头的那片薄如蝉翼的耳膜，从此只能和圣人或假圣人之口的教诲相应和。伴随着绝地天通而来的，是部分人对上天之旨意的高度垄断，是特权阶级对来自上天的消息的肆意攫取——耳朵的公共管理学自此至为明确地破土萌芽，其后的任务，不过是对它的精致化程度的一

步步提高、一步步完善。

虽然“夏道遵命，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后起的殷人似乎更热衷于占卜，对巫道更加情有独钟：殷人试图让耳朵紧贴地面，贴近龟甲或牛肩骨，却又希望自己能清楚地侦听到来自上天的秘密指令。只有全面攫取、全面接管神秘的消息，做到人与消息合一，才能让自己富有神秘感和威严感，进而通过那个专有通道，那片专门接收圣训（其实是假圣人之口的天训）的薄膜，对作为私产的消息实施第二度分配，让庶民黔首深感恐惧，推动他们对自己的崇拜。“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甲骨文合集》12870，分期一）绝地天通之后，这种神秘的侦听能力只存在于特权阶层的密室；被秘密接管的消息在合适的时刻从密室中被有意张扬出去（即第二度分配），在庶民黔首的耳膜那里更能产生出意想不到的效果。出于对耳朵的公共管理学方面的精心考虑，殷王室对上天的顶礼膜拜，达到了让后人咋舌不止的程度。

在王朝鼎立，在一场轰轰烈烈的“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大革命之后，殷商文化的主要内容被后起的周人合乎情理地全面接管，但殷商对上天的过度迷信却没有被周人照单全收：“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则“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到了周公秉政、制礼作乐的盛世年代，还正式割断了人/神、人/天之间的血缘纽带，“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成了新王朝上下一致认可的新的受命原则；周公苦心孤诣制礼作乐，为的是让人的目光最大限度地从天上回到人间，尤其是让圣人——听取天下之政的人的耳朵最大限度地倾听来自人间的声音：“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礼成为凡间人世或古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东西，成为处理人间事务的主要准绳和度量衡。和殷商相比，西周对耳朵的管理反倒显得更为严厉、更为全面：西周圣人（比如周公旦）除了偶尔向庶民黔首散布来自上天的消息，更多、更重要的消息

集散地始终会聚在“礼”身上——周礼成了人间规矩的主要辐射源，类似于远古时期操“矩”以测定天地、以刺探消息的各色巫师。

周公不仅在殷人的基础上完善了耳朵的公共管理学，还着重强调各种器官的公共管理学，对眼睛、嘴巴、耳朵、四肢的言行举止，对它们的动作/行为，都有严格的、全方位的规定（《论语·颜渊》：“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耳朵的公共管理学发端于绝地天通之后，那时，人们刚从直接听取上天之旨意的场域中被强行分离出来，刚刚适应圣训（实则是通过圣人之口说出的上天之言即天训）的耳朵，还余威尚存，有权利和义务负责管理其他的信息处理器或接收器，比如眼睛（视）和嘴巴（言）；四肢的运作（动）也直接受制于耳朵传达的指令——在耳朵的公共管理学刚刚草创的时代，其他器官的公共管理学仅仅处于密谋状态。直到周公制礼作乐之后，耳朵的尊贵地位才开始大幅度下降，最后只能屈尊和其他信息接收器或处理器一道，处于百家争鸣的平等状态，各种信息接收器对动作/行为（四肢）的管理和指挥，几乎享有完全相同的权利和机会。

是周公而不是别人发明了各种器官的公共管理学；各种器官的公共管理学仅仅是周礼的配套产品：它们既是对周礼俯首听命的忠实奴仆，又是周礼得以顺利实施的防爆警察，始终在严密监视各种器官的起居醒睡、吃喝拉撒。但各种器官并不真心实意地遵从加置在它们头上的种种管制，总在暗中蓄势待发，一有机会，就挺身而出，起义造反、打家劫舍，试图过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端着胯下长枪瞄准人世的惬意日子。孔子生活的东周，就是个器官大起义的末世；很可能正是肆意烧杀抢掠的器官大起义，决定了孔子一生的价值取向，只是这个过于神秘的思想事件没人有能力获知其答案。

尽管出身贫贱，但孔子对周代的贵族制度的维护和仰慕却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他很早就对周礼发生了强烈兴趣。在仔细对比过夏、商、周各自遵从的礼仪之后，孔子认定，唯有以维护

人间等级秩序为核心、为第一要务的周礼，最能匡扶人心，最能维护贵族制度，最有能力让天下承平，在挽救东周的颓势方面也最有力道。长相酷似孔子的有若，忠实地传达了他的老师为什么崇敬周礼中绝对的人伦秩序的观点：只要大家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安分守己，不越位行事，不希图处士横议，不放纵自己而束之以礼，天下就会太平，有节制的生活世界就会出现，消逝已久的、上下有序的西周盛世就会重新到来。（参阅《论语·学而》）面对鲁哀公“今之君子”还讲不讲礼的提问，“孔子对曰：‘今之君子，好利无厌，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民是尽，以遂其心，以怨其政，忤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虐杀刑诛，不以其治……是即今之君子，莫能为礼也。’”（《孔子家语·问礼》）作为救世良方，礼的道德优越性和有效性更是显而易见：“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戇；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

作为一个天生的时间英雄，一贯“述而不作”的孔子有足够的理由坚持他的“信而好古”：实际上，孔子只想一门心思因袭周礼，从未想过要对周礼有所创造、有所增益（“述而不作”之“作”的本义是发明、创造）。他是一个试图以现成的方法完成救世重任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对过往时代实施招魂之技的术士。只因为他始终相信，在不可能有更好的拯救方案出现之前，神圣的周礼有足够的力量解决眼下的一切问题，只需要将器官大起义之后被有意丢失的周礼之魂召唤回来即可。只要一切处于礼的法度之内，只要眼睛（视）、耳朵（听）、嘴巴（言）听从礼的节制进而管辖四肢（动）的行动取向，西周盛世就可以在东周复现，消逝已久的东西就将再次重新归来。

虽然孔子对上天怀有十分强烈的矛盾心理，时而相信，时而怀疑，但他仍然愿意将自己立志匡扶东周的行径理解为得命于天。作为一个两千多年前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意在招魂的精神术

士，孔子在骨子里崇尚复古主义。复古主义的革命性倒是显而易见，因为“古代虽为过去，毕竟有文献记载和古老传闻，实实在在；将来是什么玩意儿，虚无缥缈。古人不会‘相信未来’……生于东周季世的他，一心要回到西周盛世，也顺理成章”（李零《丧家狗》，第377页）。

孔子自信全盘通晓周礼，自信是东周时代最了解周礼的儒者。“孔子之大，学周礼一言可以蔽其全体”（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下》）——孔子对周礼的通晓使他一生都死死盯住了周公。有了周礼，一切事务都有成法可依，评价当世的一切动作/行为也就有了绝对的、岿然长存的尺度，复古主义的孔子就这样有意识地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杰出的回忆者。作为一个时间英雄，一位拒绝大师，当孔子最终明白他是一个失败的回忆者，徒有古人之口却仍然逃不脱当世之身的摆布与控制，他回忆出来的内容根本不可能化作当下的景物时，不知不觉中老之已至，身体政治学愈发严厉，周公却距离当代越来越远，器官大起义依然在高歌猛进，他的号啕恸哭就有了深刻的理由，他故意违反他大声称道的中庸之道就有了让后人同情、原谅甚至尊敬的借口。

吾“调”一以贯之

千万不要以为辉特尼（Whitney）的下述言论是在故意和语言学的门外汉开玩笑：人类之所以使用发音器官作为语言的工具，仅仅是出于偶然，顶多是为了方便；人类完全可以选择手势、使用视觉形象而不是音像形象来言说。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几句话就把辉特尼给打发了：人类之所以选择发音器官作为语言的工具，是无法摆脱的大自然强加给我们的必然宿命。辉特尼在贬低嘴巴的时候可不敢对耳朵怀有丝毫不敬，因为他肯定不敢说人类可以用鼻子而不是用耳朵来捕获声音、来侦听消息。和辉特尼的做派十分相似，远古时期的中国圣人很有些有耳朵中心主义

的癖好：“圣是聪明的意思。古文字，圣人的圣，本来写成左耳右口，和听是同一个字，圣人是听天下之政的人，要特别聪明。……聪是耳朵灵，明是眼睛明。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其实听比看，知道的事要多得多。古人更强调耳朵。”（李零《丧家狗》，第342页）仿佛是专门为人头上一左一右那两把小蒲扇寻找对称物一样，作为耳朵的配套设施，嘴巴在大自然的神秘运作下赫然现身了。从此以后，人类靠耳朵倾听，靠嘴巴言说；只有听见了、听懂了至高无上的消息的耳朵，才有能力将这些被摆渡而来的神秘消息以嘴巴为桥梁，下放给另外的耳朵，分配给那些仅仅充当信息接收器的耳朵、低级的耳朵，并把这些不入流的耳朵趁机管理起来：不仅耳朵中心主义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岿然长存，耳朵等级制度也称得上源远流长，至今长势未歇。

孔子有一双体积不大但功能极好的耳朵，仅次于那些听取天下之政的古之圣人；在整个东周时期，他是唯一一个听懂了来自周礼之声的活人。孔子对此十分自信：“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论语·八佾》）“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他满怀欣喜地接管了这些出人意料的消息，终其一生都在不辞辛劳地对这些消息实施第二度分配，试图将它们递交到每一个他愿意递交的耳朵中。在神秘莫测之中初次听到来自远古的声音时，孔子毫不吝啬地使用了他一生中极少用到的赞美语调，用以表达他接管来自时间另一头的消息时的兴奋与感激之情。尽管来自西周的昂贵之声本来应该是公共财产——殷人的圣训得之于天并且被有意垄断，因而是私有财产——但孔子是东周唯一一个能听见和听懂这些消息的人，他对众多受制于耳朵等级制度的耳朵们的慷慨解囊之举，就是值得大声称道的。

回忆者的身份深刻决定了孔子的说话方式，严格管辖着他的舌头和语调，也精心决定和控制了他的语调在方向上的走势。孔子终其一生都在转述来自远古时期的消息，从来只是个复述者而

不是制作者；与这种被他传达出来、被他大肆张扬出去的消息相匹配的，只能是语调在方向上的向后性：这是一种逆着时光消逝的方向奋力前行、拼搏与时光相摩擦才能发出和擦出的声音，但让他的同代人而不是今天的国学家异常惊奇的是，孔子竟然在不经意间就完成了这个高难度的动作。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古怪的、故意违反进化方向和得之于周礼的语调。一贯诚实的孔子似乎很乐意暴露这种性质特殊的语调的出身、来历和渊源：“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孔子毫不犹豫、自告奋勇地自报家门，愿意敞开自身语调登台表演的后门让观众进入，不过是为了寻找合格的耳朵和优秀的倾听：他确实需要配备了望远镜或放大镜的那种有“眼”光的“耳朵”——

我不过是无形事物的一名秘书，它被口述给我和另外几个人。秘书们，互不相识，我们走在没有多少理解力的人世。在中间以一个短语开始或用一个逗点结束。而完成后怎样看到全部不该由我们来过问，总之我们不去读它。

（切·米沃什《秘书们》）

特殊的语调、秘书的口吻需要拥有和它相匹配的耳朵。但森严的耳朵等级制度不无恶意地提前决定了东周时期绝大多数耳朵的命运，也最终决定了孔子的耳朵的命运：它们无法出任这样的角色，无法享用这种语调，因为胃酸分泌不足无法消化这种怪异的声音；它们唯一敬重的是进化的方向，它们乐于倾听它们认可的自然、顺畅、悦耳的声音。出于对进化的高度尊重，东周的耳朵只能接受与它们的长势相平行的语调，其中的优秀分子也仅仅能接受小部分向前冲刺着的语调。这是孔子的语调和东周的耳朵之间最初打响的遭遇战。不用说，战斗着的双方肯定相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孔子对消息实施第二度分配决心巨大，他的劳作